



新书馆

在真正的田野中触摸当代中国的静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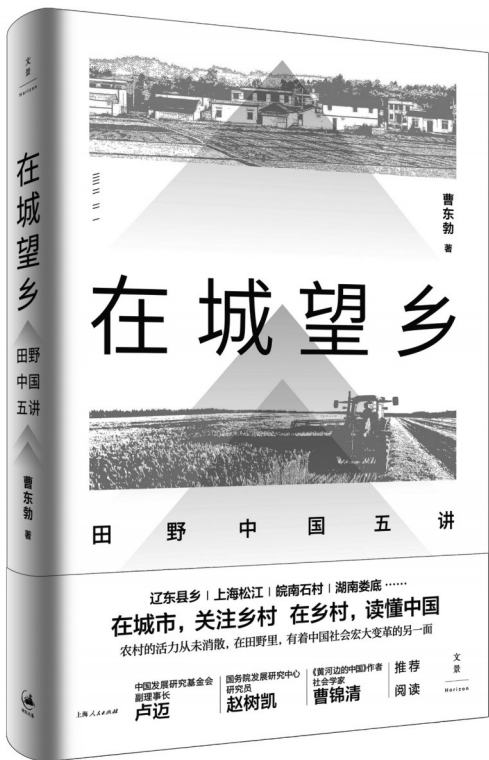
——评《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

一个协调发展的社会,不仅在于城市的日新月异,同样在于保有活力的农村、稳定发展的农业。在《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一书中,作者曹东勃结合亲身调研与理论探讨,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活面貌与生产面貌,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演变,并探讨了地方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为我们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

■ 俞珏

从进城打工到下乡务农,选择成为“职业农民”能维持体面收入吗?为什么先离开农村的一般是男性,回乡后更怀念工厂生活的却是女性?大城市是否需要配套农业,农业规模经营又该由谁主导?近日,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新著《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版)由世纪文景推出。

曹东勃是经济学博士,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卷入到乡村研究领域。他推崇陈云的“综合平衡”理念,主张探讨农村的发展振兴必须重视农村自我认同的重建。从“现状”“历史”“土地”“治理”与“出路”着眼,他试图解开城乡协调发展的密码,在见证城市化飞



驰的同时,认识一个充满活力的农村,在真正的田野中触摸当代中国的静脉。

《在城望乡》是世纪文景“中国之治”丛书的第三部作品,延续了《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平衡》与《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一贯的学术色彩和现实关怀。结合亲身调研与理论探讨,作者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活面貌与生产面貌,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演变,并探讨了地方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

描绘当代农村的生产生活图景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风俗观念受到冲击,农村的生产图景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不断变迁。困扰乡土中国千年的人地紧张突然松绑,不少乡村已经开始面临农业的“继承人危机”。与此同时,在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六成的情况下,依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往返在城乡之间。驱动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的,是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那么,新的农村人地关系格局是否能弥合这一差距提供契机?答案是肯定的。对于不具备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当工厂劳动无法提供远高于农业劳动的收益时,进城打工的动力就会大大减少。换言之,如果农业经营能带来体面的收入,务农也可以是一项职业选择,当然,这离不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资源的富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城乡差距,还存在于地区之间。在《在城望乡》一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被称为“农民农”的群体,他们是异地务农的“职业农民”,而这个群体的出现并不难理解——大城市郊区的人进城了,其他地方的农民到了这里承包土地务农,获得比在原籍务农更高的效益。相比于在城市做工所受到的规训与管制,农业经营者保有了更多的自由,不仅是作息上还是决策上。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会走上国外的农业产业模式呢?忽视土地制度与地方禀赋显然是不明智的,作者详细地分析了自己在上海松江、安徽宣城、湖南娄底等地的调研经验,提出了“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思想。松江是中国首批家庭农场的诞生地,当地在创新家庭农场制度时,尊重了制度原则,结合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在整村流转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和发挥政府作用,寻找会种田、愿意种田、能种好田的职业农民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与此同时构建良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支持,实现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三重目标。而什么样的经营规模是适度的呢?这无疑是一个动态调整变化的过程,除了地方财政的支持,农户需对从事农业与非农业成本收益进行综合测算和审慎对比。

挖掘城乡关系的历史注脚

如果说城市是大脑,乡村是身体,超前的

头脑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肉身,这正是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写照。但这样的格局是怎样形成、何时形成的呢?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往事,从阅读党史国史获得启发,帮助读者理解当下的经济社会现象。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用综合平衡的思路稳定经济工作,到温铁军教授提出的八次危机,农村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同时,发挥着无可取代的平衡作用。除此之外,很多改革和变化也在如履薄冰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城望乡》中,作者介绍了一个“粮油关系”淡出历史舞台时的“插曲”:1993年全面放开粮价、取消粮票之际,一个由未兑现粮票所形成的“500斤堰塞湖”令决策层深感不安。不过通过稳定市场、保证供应,让其自然消亡的方式,这个占当时年度粮食产量5.5%的变数并未对供求造成冲击,顺利地度过了“粮食闯关”。

当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乡村的边界不断后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不在乡村、融不进城市时,对城乡关系的反思就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城望乡》一书中,作者将“土地”视为城乡关系的核心,将对土地权益的经营与使用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础逻辑。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在《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一书中曾指出,“作为与居住权具有同样广度的不精确的措辞,共有权利是一种地方权利,因而也是一种把异乡人排斥在外的权力。”作者受此启发,深度挖掘了“集体产权”这种广泛存在于大队、村集体、城市小区等地的认同基础,对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需求”进行了分析。而城乡在用地、集体权益认同与政策运作等方面的趋同与接轨,也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协调发展应是一个自然融合的过程,它的每一步推进,都需要十分慎重。

一个协调发展的社会,不仅在于城市的日新月异,同样在于保有活力的农村、稳定发展的农业,以及自信自足的农民。今天,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乡村振兴任务依然繁重。而《在城望乡》一书能为我们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



■ 蒋子丹 时小雨

诗画集《备忘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的作者王晓冰是两个孩子的外婆。她真正开始写诗绘画,正是在做了外婆之后。即使是带外孙累得腰酸背痛,她也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和写作。

王晓冰认为,中国的奶奶和外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和外婆。她们胸中澎湃着世界上最纯粹、最无私、最丰沛的亲情之爱。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哺育、传承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唤作“年轻的外婆”,是王晓冰最开心和骄傲的事。

直到有一次,一位老奶奶猛夸外婆年轻,四岁的大宝立马大声纠正:“我外婆一点儿都不年轻了,她已经很老了!”

岁月带走了很多,但给予的更多。王晓冰说,她会一直写下去,为了亲情和挚爱给予她的力量和灵感。

认识王晓冰已经好多年。那时候海南作协集合了一群年轻活泼的女作者,笔会因为她们的参与变得生动而喧闹。王晓冰置身其中,一张白净得吹弹可破的素脸,在南国烈日阳光之下着实少见。后来,又看见她高挽衣袖,为一条濒临饿死才被收养的大型苏牧犬清洁皮毛,洗得黑水翻腾,这才知她并非只有婷婷袅袅的一面,也扛得住难事和重活,当得了“女汉子”。这样,她一边当着称职的国企中层,一边揣着颗年轻人的文艺心,忙里偷闲不声不响地码字,连她诗集里的插图,也是凭着自己少年官美术班的童子功一张张画出来的……这可能让有些人急:她知道诗坛的这个帮那个派吗?她玩得了朦胧、莽汉、草根、无意识、超现实吗?只管闷头写,只管写自己的,她能写出个什么来?

王晓冰为这本诗歌处女集起名为《备忘录》,照她自己的说法,是用文字记录被所思所见击中的瞬间。这一百多首短诗被分为五个小辑:我、你、我们、他们、它们,在目录里就体现了诗人的视野,不仅有我和你,还有他们和它们,看似信手随意的罗列,已经将大千世界包含其中。父亲寻找的墓碑、收了假币的小贩、邻家女人的呜咽、老狗失落的牙齿、折翅雏鸟的归宿、外孙童车的辙印、夏至的蝉蛻屠羊染红的白雪……日常生活丰满而又混沌的细节,被她筛选甄别之后,缠绕字里行间,表达了她对现实处境乃至生命的态度。

叙事性与描述性是这本诗集的主要特征,但王晓冰回避了抒情的叙事与描述,也不追求刻意的浅薄,反而力图给每个瞬间留下观念或者说智性的空间。当然,要是这些平实质朴的句子,再多一些飞扬的想象,该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吧。

也许单就诗而言,王晓冰错过了最佳的生理年龄,但正好比她用一贯平和的心态,留住了自己的容颜一样,王晓冰正在用诗歌,延缓着心理年龄的更迭。对于她来说,所谓“诗坛”是不存在的,写诗不过是她的生活方式之一。这样的认识一旦形成,她断不会轻易放弃。正如每逢重要赛事的电视直播,作为球迷的她总是要在朋友圈里发战况写评论,半夜三更也不例外,年复一年热度不减。至于她看得对不对,评得准不准,那又有什么要紧?

她的生活方式自由是她做主。较之于那些时刻吸引公众目光、非要把自己弄得古灵精怪不可的诗人来说,这种态度似乎更多一些诗意。

如此,甚好。

诗画集《备忘录》：一个外婆的诗与画

在时代底色上描摹女性的共性与不同

——读《我们如此相爱》

《我们如此相爱》讲述了安娜、玛丽亚、伊莎贝尔和萨拉四位中产阶级中年女性的故事。作者马塞拉·塞拉诺被誉为拉丁美洲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作家。读马塞拉·塞拉诺的书,仿佛看到了全世界的女性:她们不安、孤独却也充满力量。但是本书又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女性,她们有着拉美女性特有的性格,也展现出拉丁美洲时代变革背景下独有的魅力。

■ 萧霞

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录》里说,“宇宙分解为一团热,必定化为熵的涡动,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某些有序的区域,即存在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倾向成为某种形式;即某些特殊的点。我们在其中似乎可以见出某种图案或者图景。一篇文学作品就是这种最小部分之一。”

我们常说优秀的作家总是在时代的背景之下实现对美的追求和缔造,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达成对自我的凝视。不管他们的创作理念、写作题材以及书写技巧多么千差万别,你总能在他们所塑造的、所描写的、所批判或者颂扬的细节中发现与时代的连接。

《我们如此相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的作者马塞拉·塞拉诺是智利人,被誉为拉丁美洲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作家,从她被授予的这顶光环中我们可以分离出三个关键词:“拉丁美洲”“当代”和“女性主义作家”。因此在阅读她的作品时,我们不免会思考她与其他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异”与“同”。

女性要讲的故事几乎都是相同的

在《我们如此相爱》中,主人公安娜作为第一视角和故事讲述者,讲述了她自己、玛丽

亚、伊莎贝尔和萨拉四位中产阶级中年女性的故事。文章的开头便运用了大量有关四人外貌、穿着、性格、举止的描写来突出四人的不同,而当十年后四人再次相遇时,安娜依然惊叹,“我心想:我的上帝啊,我们四个人一定要如此不同吗?”

其实除了她们四人,文中还穿插了众多女性的形象,包括玛丽亚、伊莎贝尔和萨拉的母亲,农场里的女佣和巫师、政治运动中的女党员……这些女性与四位女主人公相比,阶层的差异更加明显,年龄、职业、家庭背景也更不同。但是她们真的就如此不同吗?

其实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这些看似千人千面的女性形象却能找到很多共同之处。她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彷徨、挣扎却又顽强地生活,虽然面临着诸多既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的压力,但是她们依然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对抗世界。

作者对于女性生活中情爱的纠缠、家庭琐事的纷扰以及事业上的两难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感同身受。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许多似乎平日都出现在身边的生活片段,如果你是女性,便更容易在读到某些场景时或会心一笑或黯然神伤。

比如这一段:“伊莎贝尔日常的一天是这样的:两点左右离开办公室,迅速赶回家跟孩子们吃午饭,喝过咖啡之后她连在床上躺十分钟的时间都没有,马上就得起孩子们送去



参加每天出席的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她下午的时间很繁忙,穿梭在学校、体育馆、学院、网球场、舞蹈课、化学实验室,又一次网球课和音乐教室之间。每个地方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都不同。”

让人不禁感叹,原来二十世纪初的智利妈妈们就开始“鸡娃”了,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虎妈”。

正如作者借主人公安娜的口说出的:“这里只有女人,任何一个女人。我们如此相似,所有人都如此相似,相似到觉得我们是姐妹。我们可以说我是在讲一个、两个或者三个人的故事,但都是一回事。归根结底,我们所有人要讲的故事几乎都是同样的。”这也正是马塞拉·塞拉诺的作品和其他女性主义作品的共同之处:以女性的视角观照女性,始终坚持对女性处境的思索。

历史洪流中女性对于情感的思考

马塞拉·塞拉诺除了是一名女性主义作

者,也是一名拉丁美洲当代作家。在她成长过程中席卷拉丁美洲大陆的革命洪流给她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滋养。“对独裁统治、政治压制、酷刑、失踪、集中营、恐慌和被迫流亡的影射贯穿马塞拉·塞拉诺的小说,这些政治因素是其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在《我们如此相爱》中表现得也十分突出。

比如土木工程师萨拉,她由于一个偶然的会与当时左派的政治领袖弗朗西斯科相识并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可以说她的感情混杂了异性间性的吸引力和青年女性对于政治领袖的狂热崇拜。“萨拉完全被这个男人和政治这两件逐渐融为一体事吸引住了。”

因此对这段感情,作者既写明了萨拉和弗朗西斯科的感情发展,又用寥寥几笔勾勒出当时革命斗争的残酷。我们一边为萨拉掩护弗朗西斯科流亡国外提心吊胆,一边又不禁为她的感情遭到背叛而感伤,这种阅读体验仿佛是在观看一部革命背景言情剧。

而另外一个主人公玛丽亚的故事仿佛是《乱世佳人》的智利版:挥霍无度出身上流的母亲、南方用以度假的广阔庄园、习惯了仆人伺候的祖母、身边围绕着保姆的童年……在她的故事中我们能看出庄园主阶层和佃农的割裂以及废奴运动后其逐渐衰败的命运轨迹。

随着阅读的推进,你会发现如此多不同场景的历史画卷在你的面前展开,短短几十年拉丁美洲土地上的风起云涌扑面而来。女性角色在时代背景的底色之上显得更加鲜明,而历史洪流中女性对于情感的思考也形成了本书有别于其他女性主义作品的特色。

西班牙著名作家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曾评价说,读马塞拉·塞拉诺的书,仿佛看到了全世界的女性。在这个语境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的共性:她们不安、孤独却也充满力量。但是在马塞拉·塞拉诺的书我们又看到不同的女性,她们有着拉美女性特有的性格,也展现出拉丁美洲时代变革背景下独有的魅力。